

中国洪水故事研究之研究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陈 建 宪

内容提要: 洪水故事在中国历史上很早就有记载,至今在中国 40 多个民族中口耳相传。对这个故事的研究有很多成果。本文集中探讨了梁启超、顾颉刚、钟敬文、芮逸夫、闻一多、鹿忆鹿、曹柯平等人的研究,对中国洪水故事研究史作了回溯性的评介与分析。

关键词: 洪水故事 研究史

2005 年新年伊始,整个世界都在为印度洋海啸造成的巨大人员伤亡而震惊。地震引发的大洪水呼啸而至,顷刻间夺去 16 万多人的生命,这个惨剧让人类再次意识到大自然的威力,意识到人类只不过是自然之子。有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又成为人们思索和谈论的热门话题。

自从人类诞生于这个星球,不知道有多少人丧生于洪水之中。那些在灾难中侥幸逃生的人,将洪水事件代代传讲,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集体记忆,这就是洪水故事。洪水故事是世界上流传最广泛的民间故事类型之一,正如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著名民俗学教授阿兰·邓迪斯(Alan Dundes)所说:“在世界上所有的神话中,大概没有哪一个像洪水神话那样,引起了有史以来若干世纪的人们的注意。的确,不可胜数的书籍、专著和文章为这个神话而作。以数量而言,洪水神话无疑是过去被研究得最多的叙事作品。没有哪个神话或哪个民间故事、民间传说,曾像这个关于一场灾难性的洪水故事这样,被人们加以细致深入的研究。”¹

19 世纪以来,人们怀着巨大的兴趣,在世界各地广泛搜求,记录和发表了数量多得难以统计的洪水故事,并从各个角度对这些故事中隐藏的秘密展开了探查。目前,学术界已基本摸清,世界上的洪水故事,可以大体分为地中海、印度、东南亚、大洋洲、美洲、非洲等多个大大小小的故事圈。

在中国,洪水神话也广为人知。笔者在写作博士论文过程中,检索了中国各族流传的洪水神话文本,仅笔者所见,在中国就有 41 个民族中流传着 568 篇洪水故事。自 20 世纪以来,中国学者对这个故事不懈地进行着探索。

20 世纪 20 年代,随着西学东渐,中国学者已经注意到洪水故事的世界性,并将视线投向中国源远流长的古代文献,在古籍上细心搜求洪水神话。1922 年,梁启超在《太古及三代载记》

1、《洪水神话》(THE FLOOD MYTH),阿兰·邓迪斯(Alan Dundes)编,美国加州大学出版社,1988 年版。第 1 页。该书是一本论文集,书中汇集了一百多年来世界各国学者研究洪水神话的一些代表作。作为这个研究计划的一部分,笔者已和我的研究生们一起将全书约 45 万字译出,本来在 1997 年时上海文艺出版社就接受了这部书稿,后来因经济原因未出版。我非常感谢阿兰·邓迪斯教授,他不仅赠送给我这本著作,而且积极主动地帮助我们联系解决了它在中国出版的版权问题。就在笔者撰写此篇论文期间,惊闻这位杰出的学者在讲课中突发疾病去世,不胜悲痛之际,更激励笔者努力进行这项研究,希望能以学术的推进来告慰先贤。同时也希望今后有机会让这些西方学者的经典成果能在中国出版,使更多研究者受益。

“古代传疑第一”及其附录“洪水考”中，指出中国古籍上有关洪水的记载有三：一是女娲积芦灰止淫水；二是共工振滔洪水；三是鲧禹治水。他从比较神话学的角度出发，将这些神话与《旧约·创世纪》、印度、希腊、北欧、南太平洋群岛的洪水神话加以比较，指出这些地方不约而同地出现这类神话，必是当初整个地球都经历了同一场大洪水，并认为这场洪水是由地球与其它的行星或彗星相错而形成的。他指出中国洪水神话有自己的民族特点，例如中国人没有上帝惩罚的宗教观念，“故不言干天怒而水发，乃言得天佑而水平。”并且女娲、共工和鲧禹，皆不屈服于自然，表现了“常欲以人力抗制自然”的理想。他还指出洪水在中国历史研究上的重要意义，认为中国新疆的大沙漠由洪水形成，此前这里“俨为东方之小地中海，或遂为我国文化最初发荣之地。”²

顾颉刚先生是“古史辨”学派的旗手，这个学派通过考证中国古籍资料上的一些主要人物与事迹，提出了中国古史是层累而成的观点。顾先生研究中国古史的突破点，是大禹治水的传说。1923年，他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中，提出了“古史辨”派的基本观点与方法，指出在周代人心目中，并没有一个许多民族公认的始祖，那时候，人们所知道的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才有尧舜，战国时才有黄帝、神农，秦代才有三皇，汉代才有盘古。越是后起的传说，其中心人物越是被放大。他重点研究了关于禹的记载，指出禹是神而非人，他是上帝派下凡来平治洪水的山川之神，是“南方民族的神话中的人物”。用他自己的概括是：“商、周间，南方的新民族有平水土的需要，酝酿为禹的神话。这个神话的中心点在越（会稽）；越人奉禹为祖先。自越传至群舒（涂山）；自群舒传至楚；自楚传至中原。流播的地域既广，遂看得禹的平水土是极普遍的；进而至于说土地是禹铺填的，山川是禹陈列的，对于禹有了一个‘地王’的观念。中原民族自周昭王以后，因封建交战而渐渐与南方民族交通，故穆王以来始有禹名见于《诗》、《书》，又特设后土之祀，得与周人的祖先后稷立于对等的地位。”³ 顾颉刚先生后来还发表过《鲧禹的传说》（1939年）和《息壤考》（1957年），可见他对大禹治水的神话始终耿耿于怀，希望揭开它的真相。

1931年，钟敬文《中国的水灾传说》，不仅搜罗了古籍中的伊尹传说，《搜神记》中的陷湖传说等，还引用了现代口传故事中的陷湖传说和人类毁灭再造神话。这种对当代口述资料的重视，是五四歌谣学运动以来中国学术转型的重要成就，而钟先生首次将与古籍文献记载不同的口传洪水再殖型故事，纳入了中国洪水故事的系统，在研究资料的使用上是一个重大突破。同时，这篇文章也将中国洪水故事与希伯来神话进行了比较，认为中国洪水故事是一个与希伯来神话和西方其它民族神话相异的“系统”；还对传说中的几个原始文化因素（梦应、预兆）进行了探讨。⁴

2、引文见马昌仪编《中国神话学文论选萃》，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年，上册。

3、“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引自《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8年，第151—152页。

4、钟敬文：《中国的水灾传说》，原载杭州《民众教育季刊》第1卷第2号，1931年2月；收入《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下），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163—191页。

1937年，芮逸夫在湖南湘西考察，从当地苗族记录到几篇口传洪水故事，还得到了两篇讲唱文本的文字资料。他在《苗族的洪水故事与伏羲女娲的传说》的长篇论文中，引用了10多篇异文。并从一些西方学者的田野笔记中，发现了几篇极为珍贵的南方少数民族异文。这篇论文将故事中的兄妹与古籍中的伏羲女娲作了比较，认为苗族故事中的主角Bu-I即汉族故事中的伏羲，在苗语中意为“始祖”。他对伏羲女娲的族属进行了推测，认为伏羲女娲故事是苗族的洪水遗民故事，汉人强为已有。古代汉族文献上所载的伏羲女娲，乃是苗族的洪水遗民故事。他参照巴林高尔德的印欧故事分型方法，将所有这类故事归纳为一个类型，命名为“兄妹（兼指姊弟）配偶型”洪水故事。推断“这种形式的洪水故事的地理分布，大约北自中国本部，南至南洋群岛，西起印度中部，东迄台湾岛。”他建议将这一区域称为“东南亚文化区”。认为该文化区的中心在中国西南，并推测：“兄妹配偶型的洪水故事或即起源于中国的西南，由此而传播到四方。”⁵ 这篇文章的资料发现与惊世之论，对于中国洪水再殖型故事的研究来说，可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20世纪40年代，闻一多先生利用新发现的一些少数民族口传故事，将这一课题的研究又推向了新的高峰。他从1942年起，连续写作了一系列论文，遇害后由朱自清整理为《伏羲考》，收入《闻一多全集》。在这些文章中，他将48篇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洪水遗民神话异文，与中国古代文献、相关考古资料等结合起来进行深入的考证和比较。他论证了中国古代的人首蛇身像以及双头蛇、二龙之神等均与伏羲女娲有着共同的神话源；认为龙是一种因部落兼并而产生的混合的图腾，龙图腾在中华文化中占有优势地位，如夏族、共工、祝融、黄帝、匈奴等族，都属于龙图腾；他指出洪水常与战争相关；洪水故事的核心是造人，造人的核心是葫芦，而伏羲女娲的原型正是葫芦。他对洪水造人神话作了这样的评价：“这是原始智慧的宝藏，原始生活经验的结晶，举凡与民族全体休戚相关，而足以加强他们团结意识的记忆，如人种来源，天灾经验，与夫民族仇恨等等，都被象征式的糅合在这里。”⁶

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一批民族学家通过实地田野作业，对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一些口传神话进行了科学的记录，他们发表的一批文章，⁷ 如《苗族中祖先来历的传说》（吴泽霖，1938年）、《苗瑶之起源神话》（马长寿，1940年）、《生苗的人祖神话》（陈国钧，1941年）、《云南土民的神话》（马学良，1941）、《傣族的洪水传说》（陶云逵，1948）等，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1949年以后，除了汉籍上的大禹治水神话继续是学者们探讨的热门话题外，洪水再殖型故事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新焦点，出现了许多重要成果。如李卉《台湾及东南亚的同胞配偶型洪水传说》（1955）、李霖灿《么些族的洪水故事》（1957）、李子贤《试论云南少数民族的洪水神话》（1980）、陈炳良《广西瑶族洪水故事研究》（1982）、乌丙安《洪水故事中的非血缘婚

5、芮逸夫：《苗族的洪水故事与伏羲女娲的传说》，载《人类学集刊》第一卷第一期，1938年。

6、闻一多：《伏羲考》，见朱自清编《闻一多全集》第一卷《神话与诗》。

7、参见马昌仪编：《中国神话学文论选萃》，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年，上册。

姻观》(1982)、宋兆麟先生《洪水神话与葫芦崇拜》(1988)、钟敬文《洪水后兄妹再殖人类神话》(1991)、张振犁《中原洪水神话管窥》(1991)、鹿忆鹿《洪水后兄妹婚神话新探》(1993)、王孝廉《西南族群的洪水神话与水神信仰》(1994)、傅光宇《“难题求婚”故事与“天女婚配型”洪水遗民神话》(1995)、吕威《中国洪水神话结构分析》(1986)、《楚地帛书敦煌残卷与佛教伪经中的伏羲女娲故事》(1996)等等。另外,有一些专著,如杨利慧博士的《女娲的神话与信仰》和《女娲溯源》等,也有相当的篇幅涉及这个故事。⁸

有学者统计,从1905年至1998年间,仅中国学者发表的有关洪水故事研究的论文,就达401篇(部)之多。⁹一些学者将20世纪中国洪水神话研究的角度归纳为四个:一是历史学;二是神话学;三是民俗学;四是文化人类学。¹⁰

随着洪水故事文本的不断发现和研究的不断深入,近年来,以这个故事为研究对象的专著顺理成章地出现了。笔者所见到的两本,一本是台湾东南大学中文系教授鹿忆鹿女士的《洪水神话——以中国南方民族与台湾原住民为中心》¹¹,一本是曹柯平先生的博士论文《中国洪水后人类再生神话类型学研究》¹²。

在鹿女士著作中,第一次对中国洪水神话(包含洪水传说和洪水故事)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归纳与总结。如有关中原地区的洪水神话研究成果,鹿著在全面整理了相关研究成果后得出结论:“洪水后兄妹婚型神话,至少在汉代民间已形成了完整的洪水神话文本。此类型神话中的伏羲女娲二神,最初很可能分属不同的个别神话文本,而洪水与生人两个母题也是后来才拼接起来的。经历过漫长的时间和风尘,其原始思维铸造而成的洪水故事仍然富于生命力,至今不衰,仍然在从南到北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大半个中国许多地区里流传着。”¹³这个结论看上去似乎简单明了,但其中却包含了近百年来不知多少学人的心血。

鹿忆鹿的著作在洪水故事研究中也有一些新发现。如:她将台湾原住民洪水神话分为洪水后兄妹婚神话和蛇鳗引起洪水神话等不同支系,对其中的高山避水母题、木臼避水母题、取火母题等,联系人类学资料进行考察;对天女婚洪水神话中有关一目人、直目人等眼睛神话母题进行了探讨;等等。她认为洪水神话的一个普遍性象征意涵是死与再生的通过仪式,“不管是兄妹血亲婚中的人类毁灭与再生,或天女婚神话中的衰老再年轻情节,或是原住民神话的火种失而复得、土地可耕种、谷物、鱼虾的起源,或汉族洪水神话中有宇宙秩序的破坏与重建,都有死而复生的象征意涵。”¹⁴

相较于鹿忆鹿著作以丰富的资料见长而言,曹柯平先生的研究更具理论色彩。这篇博士论文表现了作者很高的学术追求,希冀从洪水神话的研究中,建构一种有“类似考古地层学一样

8、上述文章的原出处均见书末的“参考文献”。

9、曹柯平:《中国洪水后人类再生神话类型研究》,博士论文未刊稿,2003年12月。

10、柳莉、贾征:《20世纪中国洪水神话研究综述》,载《武汉水利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

11、鹿忆鹿:《洪水神话——以中国南方民族与台湾原住民为中心》,台北里仁书局,2002年版。

12、曹柯平:《中国洪水后人类再生神话类型研究》,博士论文未刊稿,2003年12月。

13、鹿忆鹿上书,第338页。

14、鹿忆鹿上书,第5页。

的结论检验机制和排比参照系统”的神话类型学，“对于中国神话学的科学规范化”作出自己的贡献。

曹先生的论文在神话分类方面大大加强了民族语言学的作用，将神话文本与所属语系、语族，甚至语支相对应，以此作为对洪水神话口传文本进行科学分类的平台，将中国洪水神话文本分为藏缅族群、苗瑶族群、壮侗族群及其他族群几个集群。他继承和改良了传统的母题分析方法。将“母题”重新界定为“从它们（即故事）中提炼出来的，并在特定的神话里具有组织和构成情节能力的故事要素”，¹⁵ 希望通过“母题的组合”来把握各族群中的洪水神话的特质。他以 151 篇中国各族洪水后人类再生神话为对象，将中国洪水神话分为七型五式，即藏缅族群的 A 型（含 A I、A II、A III 式）、B 型、C 型；苗瑶族群和壮侗族群的 A 型（亦含 A I、A II 式）；此外还有阿尔泰民族、南岛民族、汉族各一型。遗憾的是，可能限于篇幅或研究尚处于进行过程之中，他的论文仅对藏缅族群部分进行了完整分析。

曹著在界定神话的时间深度方面作了相当大的努力。他在对藏缅族群洪水神话的研究中，广泛征引语言学、考古学、民族学和历史地理学相关成果，推断这个族群中流传的 A I、A II、A III 三种型式的洪水神话，分别流行于商代晚期、春秋战国时期和汉晋时期。这为解决中国洪水神话的发生学问题作了可贵尝试。不过，曹著显然忽视了民间口头传统中故事的变异性，他对所引洪水故事文本的采录时间未作详辨，甚至连采录时间都未著录，这就忽视了洪水故事在产生传播过程中由简单到复杂、不同母题的粘合过程。此外，将讲述者的族属等同于故事族属也存在一定问题。

中国百年来洪水故事研究呈现出一种加速度趋势，文本发现越来越多，研究越来越深入，在国内外学界的影响越来越大。但也存在明显不足，其中最突出的是缺乏本体论研究，即将洪水故事作为故事的研究。人们对发掘故事背后历史的兴趣，显然超过了阐释其艺术魅力的兴趣。在方法论上虽采用了很多相关理论，却缺乏针对民间故事特点的专门故事学方法。此外，从不同侧面研究这个故事的文章虽然不少，但从宏观层面对中国洪水故事进行科学描述的工作尚未完成。因此，对于这个故事的研究，学术界任重而道远。

15、曹柯平上书，第 76 页。